

“在传统中变”：清季安徽的学术沿革 与“存古”履迹

郭书愚

【摘要】晚清最后几年，中国传统学术整体上呈崩坏断裂之势，似经典的研究在安徽仍蔚为风气。官绅皆有意追寻传统的兴学理念和方式，更在文化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深度契合。古学的保存和传承，文教事业的发展，乃至学术风尚的嬗替，固不乏开放而前瞻的一面，但大体仍是“传统中变”的演进脉络。重建清季安徽的“存古”履迹，可见当时皖省官绅对于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的独特思考和选择；而由文教事业的兴办视角，关注当时皖学的传承脉络和特色，可以观察到注重师承“家法”，而又开放包容的学术传统在近代特定时空中的承续，并为进一步研究相关精英士人，以及清季民初的学术与文化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关键词】保存国粹；晚清“新教习”；存古学堂；清季安徽；皖学沿革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 (2017) 01-0083-09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学在与西学的激烈竞争中惨败，导致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至清季，士人中普遍弥漫着对国家衰弱的焦虑情绪，以及急于追赶西方“文明进步之大势”，“争存于世界”的紧迫感。尊西趋新的世风愈演愈烈，传统则在整体上逐渐从社会的主流思想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在传统之外变”（change beyond tradition）乃至有意“背离传统而变”（change against tradition）成为主流的社会风尚。在这样一幅动态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中，古学研习和保存方式的消逝、兴学理念和举措的改变乃至学术风尚的转移，皆是相当值得注意的面相。

另一方面，区域发展的不同步和多歧性是近代中国的又一显著特征。传统固然在整体上呈崩坏断裂之势，但在个别地方，经典的研究直到晚清最后几年仍然蔚为风气。即便是主要参照外国榜样制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全面推行之际，仍有官绅在“新教育”的实际运作中意图追寻传统的兴学理念和方式。在这些地区，古学的保存和传承，文教事业的发展，乃至学术风尚的嬗替，当然有鲜明的时代印迹，但大体仍是“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radition）的演进脉络。四川即是其中之一，安徽可能是另一个相当有特色的例子。

清季安徽从省城到基层普遍有较浓郁的“存古之风”。官绅对于保存国粹有相当强烈而共同的关怀。他们以明显不同于当时主流风尚的方式兴办安徽存古学堂，视其为皖学传承的希

望。该校作为皖中各学术流派以及部分非皖籍学人交流互动之地，正是清季皖学风尚的缩影。相关面相此前并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笔者迄今未见专门以此为题的研究。

进而言之，安徽存古学堂的办学员绅中不乏清季民初学林的重要人物，如沈抃植、冯煦、姚永概、马其昶、程朝仪、胡元吉、李详等。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他们在近代学术风气嬗变以及思想文化论争中的地位，但相关研究似乎仍有较宽广的拓展空间。葛兆光教授早在十年前即有专文谈学术史研究对沈曾植的长期“遗忘”。唯据葛先生新近的观察，这样的“遗忘”似乎仍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程朝仪、胡元吉师徒相承的理学在晚清安徽一度相当盛行，但程氏为办存古学堂病故，胡氏辛亥鼎革后“学伯夷归隐”。这一学脉甚早即处于明显“失语”（voicelessness）的状态。

桐城派是清季民初安徽的学术重镇，马其昶、姚永概是其头面人物。学界较多关注他们在辛亥鼎革及民初时政治上的“保守”，以及文教学术与章太炎弟子和新文化派的论战。何据桑兵教授新近的观察，五四前后桐城派被章太炎弟子和新文化派“猛烈抨击”，“大有被妖魔化之势”。实际章太炎本人后来对桐城派及“桐城义法”多有肯定。而由“桐城谬种”一词的广为人知即可见桑先生所言“妖魔化之势”的确甚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时人及后之研究对桐城派的整体认知。

这些民元后多以“保守”著称甚至被“妖魔化”的“旧人物”，在清末实际的思想观念和作为，是过去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当时他们兴办或参与文教事业的相关活动，多数既存研究或忽略不言，或一笔带过。本文以相关档案和当时报刊、文集、日记、年谱等资料为基本依据，尝试重建安徽兴办存古学堂的部分史事，侧重由文教事业的兴办视角，关注清季皖学的部分特色和传承脉络，希望能有助于我们深入认知剧烈动荡的清季中国社会那群“不变”或是“在传统中变”的层面，并为进一步研究相关人物和清季民初的学术与文化提供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

一、“延见古先不坠之绪”的办学努力

晚清士林普遍将兴学视作救亡图存、追赶西方的关键，教育由此而成为清末“新政”最重要的“政务”之一。就建制层面（institution）整体上概而言之，当时制订并颁行的一整套“新教育”规章明确以外国为榜样，传统教育从办学理念、思路到具体形式和举措，几乎尽皆成为被摒弃和批判的对象，说其是“在传统之外变”，应不为过。作为“新教育”体系中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存古学堂正是要用“学堂”这一新形式造就“研精中学”之才，“养成传习中学之师”。首倡者张之洞即相当强调该校与任何新式学堂无异，而“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安徽兴办存古学堂的努力固不乏开放而前瞻的面相，整体上则呈现出一幅明显更贴近传统的历史图景。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安徽提学使沈曾植（时兼署安徽布政使）命士绅姚永概、吴

季白草 拟存古学堂章程。此后不久，沈氏与新署安徽提学使吴同甲联名向安徽巡抚冯煦提议兴办存古学堂，得到冯氏支持。同年九月中旬，名儒程朝仪应邀由黟县故里至省城安庆商办存古学堂事宜。但此后筹办工作因故中止。

至宣统二年四月（1910），时任安徽巡抚朱家宝决定“重行兴办”安徽存古学堂，程朝仪再次应邀至安庆商订该校章程并出任监督。虽然程氏在筹办该校期间病逝，但在朱家宝、沈曾植、吴同甲等热心官员以及缪荃孙等名士的共同努力下，安徽存古学堂聘请到朱孔彰（仲我）、姚永概（叔节）、李详（审言）、胡元吉（静庵）分任经学、词章学、史学兼《文选》学、理学教员，吴同甲以提学使身份兼任该校监督，王咏霓（子裳）出任提调。这一精萃的师资阵容有相当的吸引力，尹炎武即因仰慕朱孔彰、李详二人而赴皖求学，得偿所愿。

安徽兴办存古学堂，一个明显贴近传统的兴学思路是对整个皖 W 士风与学风的注重。该校招生便打破清季“新教育”的常规（即由州县官、教育会或“学界”保送至省城参加复试），而延用“古 观风试”。具体作法是由沈曾植、吴同甲会衔将经、史、文学、理学试题札飭各属地方官出示考试。凡“家世清白、年在二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的皖籍士子，皆可应试，“三艺完卷，经、史必作一题 方为合格”，限期将卷纸寄到省城，此举显然便于直接了解各属士林风气，在沈曾植而言，或不无履行“观风”这一清代学政重要职责之意。而无需具结保送还可最大限度地“鼓舞多方、网罗殆 遍”，但据李详所述，也出现“倩荐者多，不辨真伪”的情形。

安徽办学员绅对于皖省的古学风气颇为乐观。当时即便是“新教育”体系中也不乏对中国传统 学问有浓厚兴趣的读书人，故安徽存古学堂除正额录取外，还招收“肄业他种学堂、不妨碍应修学科而愿兼习经史文理者，为附课生”。按，张之洞固然是因“各学堂经史汉文所讲太略”而办湖北 存古学堂，却并未将其他新式学堂在校生直接纳入该校的教学计划中。类似安徽这样力图直接提升“新教育”体系的中学水平的办学思路，也见于广东和浙江两省兴办存古学堂的努力中，但具体作法 明 M 不同。广东学务公所“普通科副长”陈佩实便着眼于新式学堂的教师而非学生，提出应准许新 式学堂教员报考存古学堂，录取后单独成班而浙江官书局总纂姚丙然拟令该省所有“中学毕业而 于经、史、国文分数不足者，须入存古学堂补习后，方予奖励”。这样的存古学堂已变为普通中学 堂经、史、国文课的辅助教疗机构。安徽办学员绅则仍然秉承张之洞造就“研精中学”之才，“养成 传习中学之师”的“存古”初衷，只是基于对皖中古学风气的预判，为学有余力的在校生提供自愿 兼习中学的机会，与姚丙然的强制性“救弊”举措适成鲜明对照。

实际上，“附课生”的设置渊源有自。清代安徽声名最著的敬敷书院自乾隆十七年（1752）即在“内课、外课”生之外设有既无诤火、也无定额的“附课生”，后更形成皖抚亲自“按试”书院，甄别优劣，“升降内、外、附课之士”的传统。安徽存古学堂的“附课生”同样没有正式的编制和定额限制，但招录范围则限于新式学堂的在校生群体。显然，安徽办学员绅变通了传统书院的“附课生”制度，赋户存古学堂直接而速效的为“新教育”服务的功能

能够“附课”的，当然是与存古学堂同在 W 城安庆的新式学堂在校生，但安徽办学员绅对于存古学堂的期许并不止于此。该校还招录“哲城外各县通信学习者为校外生”，力图将影响扩及基层州县。按，清季中央政府不准基层州县兴设存古学堂以免“有碍新机”。在此情形下，确有省份试图将“存古风气”推展至基层州县。光绪三十四年刘师培呈请两江总督端方奏设“两江存古学堂”，即提出“将教师所编讲义月刊成册，颁发所属各州县，使官立、民立各校奉为参考之资”。宣统二年底四川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移请全川各府厅州县查收一份“募捐启”，意在“导扬风气”，希望各地“有道君子”能够为学校捐助钱款、图书、金石器物等。“观风”之后“导扬风气”，正是清代学政于基层州县通常的兴学理路。唯就具体举措而言，安徽存古学堂力图通过“通信学习”的渠道将省城的教学活动延展到基层州县，这一多少有些类似“函授”的方式“新”意十足，正是时代风貌的体现。

实际上，安徽存古学堂相当有吸引力，从一个侧面印证当时皖省确有相当浓郁的“存古”之风。该校“附课生”与“校外生”皆无定额限制，但“正课生”只有 50 个名额，是目前所知清季各存古学堂中最少者。“观风试”总计收到 650 多份试卷，录取比例不到 1/13，淘汰率高达 92%以上，竞争显然相当激烈。

尤为不易的是，校方“以通经学古，为道德名誉之事，不导人于利禄之途”，规定学生毕业后不奏请奖励。这也是该校与其他存古学堂的另一重要不同之处。盖“奖励”意味着比照旧功名的资格，正是当时学子们普遍看重的。安徽存古学堂在没有“毕业奖励”的情形下，仍能吸引到众多考生，其入学考试的淘汰率甚至是目前所知清季各存古学堂中最高者。这样的情形在清季“新教育”中即便不是唯一特例，也相当罕见。安徽存古学堂“不导人于利禄之途”的作法，与嘉道以降兴起的“不课举业、专勉实学”的书院，在办学精神上或不无相通之处：让“古学”的研习和传承摆脱官方的功利导向，回归其学术的本位。

但与诂经精舍、学海堂等书院以考订训诂为宗不同，安徽存古学堂特别推重理学。沈曾植以元儒程端礼所撰《读书分年日程》为办学蓝本，试图将理学灌注到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中。这样一整套旨在以中国传统“教法”保存“古学”的思路，与清季“新教育”的规章和导向明显不同，其背后隐伏的“中西学各有体用”的文化观，尤与当时主流的“中体西用”论大异其趣，在实际运作中面临的阻力和压力已到“为时流大哄”的程度。

该校实际的筹建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更一度引发争议而险些半途而废。宣统二年七月，沈曾植卸任离皖。次月，安徽即出现对存古学堂的“异议”，矛头直接针对沈氏在任时筹定的办学款项。在朱家宝竭力维护下，该款终得以保全。沈曾植得知此事后，感叹：“欧日政策，不随人改，我则政以人移，长此纷纷，其何能淑？”筹建工作并未照沈氏原计划在当年暑假后就绪，经朱家宝催促，大约在同年十一月完成。翌年三月一日，该校始正式行开学礼。

安徽存古学堂从办学理想到实际运作，能够冲破重重阻力付诸实践，该省浓郁的“存古之风”，尤其是热心士绅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安徽官绅为办存古学堂有较充分的讨论和商议。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底，沈曾植曾招姚永概同程朝仪、胡元吉、马其昶、姚永朴“谈自治及存古事，甚畅”。至宣统二年上半年，沈氏的办学方案得到姚永概、马其昶、程朝仪的认同，具体办学章程则由程朝仪、姚永概、朱孔彰三人商订，沈曾植最终定案。若说官绅的共识与合作是该校虽明显不同于清季主流办学风尚而仍得以开办的基石，应不为过。

皖省官绅看重安徽存古学堂并为之付出相当心血，体现出较强烈而共同的“存古”关怀。程朝仪数十年“不慕时荣、不事酬应”，专意于学问和课授之事，晚年以古稀高龄两度应邀筹办并主持存古学堂，未必有多少出占馆地之欲，恐怕更多是名利以外的关怀所致。姚永概也对安徽存古学堂情有独钟，他在阅完存古考生观风试卷后，即将70元薪金交还吴同甲。翌年三月（1911）他以身体不佳请辞安徽师范学堂监督一职，但仍愿意出任存古学堂讲席。姚氏看重的，显然不是薪金所得，而是以“师”的身份践行自己的“存古”关怀。

类似的“存古”关怀并非程、姚二人独有。姚永概在安徽存古学堂开学典礼上的演说，即“颇为众所称许”。吴同甲在宣统二年夏致程朝仪的信中也明确指出，“贵省士林，笃信旧学”。而“古先不坠之绪”，正要通过安徽存古学堂“延见”。最后一语大体可说是当时皖省官绅对安徽存古学堂的普遍认知：作为当时安徽唯一的国学高等专门研究和教学机构，该校承载着皖学传承的希望。

二、“有余于古文之外”：清季皖学的沿承和风尚

在兴办者眼中，安徽存古学堂实为传统学术在皖中薪火相传的事业。冯煦即明确指出，安徽“为晚周哲学发生之地，南宋大贤踳躅之邦。入国朝来，魁儒大师，项背相望，盖道德之渊藪，文艺之林囿也”。办存古学堂，是“横舍宏图，纒绵前绪”。沈曾植、吴同甲在致程朝仪的信中也说，安徽“为国朝斯文枢纽”，程氏出任存古学堂监督，是“继乡前哲婺源（朱熹）之遗徽，续令先德伊川（程颐）之道绪”。

该校的招生考试题目相当注重皖学的学术渊源和特点。其中一题为“昔朱颍川问士于郑召公，韩吴郡问士于刘圣博，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濮阳兴问士于清河，皆言本郡人物。皖邦旧多英俊，试效其体作答一篇”。另一题是：“徽郡经学，桐城古文，名家甚盛，试叙而论之”。地域学术文化的特色也体现在科目配置上。张之洞的存古方案将“小学”课附于经学科内，“诸子学”则是经、史、词章各科学生的“通习课”。而安徽存古学堂则将上述两门课都归人文学科，似乎更看重并强调二者对于研习文学和写作的辅助作用，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文学的特殊地位。

由安徽存古学堂师资的“家法”，可以初略梳理出其源流有A的学脉传承轨迹。经学教员

朱孔彰 传其父朱骏声之学，年少时师从程朝钰（字伯坚，程朝仪长兄）。程朝钰、程朝仪同为朱骏声弟子，朱骏声最重要的学术著述《说文通训》即由程朝仪校录而行世朱骏声则承乾嘉学术大家钱大昕（竹汀）之学。程朝仪力倡“以诂训为明经之本，诂训通而义理自无空谈”，正与钱大昕“穷经者 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的主张一脉相承。

程朝仪而立之年讲求性理之学，固然是其个人际遇和性情使然，可能也多少与其师承特点有关。朱维铮教授已注意到，钱大昕倡导“实事求是、不主一家论”，实非“所谓汉宋门户之见的偏执者”。有意思的是，安徽存古学堂理学教员胡元吉（程朝仪弟子）早年任敬敷书院院长，与邓绳侯、王蔚岑、马通伯、姚永朴、姚永概、方守#、赵伯远等“博学能文之士”交游，其治学也有变化，“虽笃志程朱，颇亦博涉古今学说以自广”。如果说“笃志程朱”是在守护“家法”，则“博涉古今 学说”显然是无“门户之见”的互动交流所致。

文学教员姚永概以及参与筹谋该校的马其昶皆是近代桐城派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汉学 与反汉学之争中，桐城派与乾嘉汉学原为对立双方，且多有过节（尤其钱大昕对方苞批评有加，而后钱氏又成为方东树着力攻击的对象），但在清季安徽兴办存古学堂的文教事业中则有较密切的共事与合作。他们皆看重各自的“家法”，且论学不无分歧，但显然没有势如水火的“门户之见”和争斗。^⑩实际上，姚永概与程朝仪虽交往不多，但关系似较睦，尤与胡元吉过从甚密。

这样“和而不同”的图景大体上是当时皖省开放而多元学风的缩影。王遽常在《沈寐叟年谱》中说，沈曾植出任安徽提学使，“先后招致苻儒桀土程抑斋、方伦叔博 t（守韩）、常季、马通伯主事（其昶）、邓绳侯、胡季庵、徐铁华、姚仲实（永朴）、姚叔节解元（永概），时时相从考论文学。人谓自曾文正公治军驻皖以后，数卜年宾客游从之盛，此其最矣”。最后一语是注引姚永概在《慎 宜轩诗·自序》中的观感。而前引胡元吉与诸多“博学能文之士”交游后的治学变化，正是清季皖 学风尚影响个体学人的典型例子，也揭示出当时皖中学人“时时相从考论”的，应不限于文学。

除聚集皖中学人外，沈曾植还敦请王闿运、缪荃孙、李详等名儒宿学至皖。而李详更以非院籍身份，且对桐城末流之弊颇有微辞，仍被礼聘为安徽存古学堂史学兼《文选》学教员。清季学林对桐城派固然有不少质疑和批评，但多有其特定所指，未必皆取与桐城精英对立的立场，实与五四前后钱玄同等章门弟子和新文化派学人对桐城派几近“妖魔化”的攻击明显不同。如李详当时引起较多关注且对后之研究者影响深远的《论桐城派》一文，即主要针对一味拘守文章形式而与姚鼐“义理、考据、辞章缺一不可”之义背道而驰的桐城末流之弊：李氏在文尾特意申明：

余与今之能治古文者，皆在相知之列，其学又皆有余于古文之外，余之所言盖专为救弊 而发。

李详自视甚高，平生论学不轻许人。所谓“其学又皆有余于古文之外”，大体可说是他对清季桐城古文家学术取向的整体观察，相当值得注意。实际上，李洋和姚水概、马其昶等桐城派精英不仅在清季安徽存古学堂中共事与合作，私下更有较密切的交流和唱和。\$唯就个人性情和文风而言，李详对桐城文章一直颇不以为然，这一学术倾向并未因其与桐城派精英交契而改变。但这或许正从一个侧面提示着：安徽存古学堂的办学取向和当时皖省学风，确有超越地域区隔且包容歧见的一面。

开放而包容的学术风尚也体现在学堂的实际办学运作中。招生工作即放宽了原拟“正课生”限招皖籍士子的规定，籍隶江苏的尹炎武即以客籍身份报考，终被录取。在教学方面，教师的执教风格和授受理路迥异其趣，学生则反应不一。朱孔彰相对简明而易见成效的授学思路似乎颇受学生欢迎。其“教士之旨，大致谓雕版既兴，载籍愈夥，穷赅毕览，U不暇给。先秦两汉之书为学术根柢，苟志于学，当知所先务，于《尔雅》《说文》溯其原，于释文义疏尽其义。百家诸子，观其流别；《通鉴》《通考》，得所据依，旁及《骚》《选》古文”，学生“随才性之所近”研习，“数年之间，可以自立。从之者如被雨和风，有陶然自得之趣”。李详则“以‘四刘’之学教士。‘四刘’者，《汉志》《世说》《文心雕龙》《史通》也。而于《三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厌饫优柔；子部杂家之学，唐宋笔记之流，如瓶泻水”。虽然“生徒敛衽”，但“能传其学者盖寡，惮其繁难，无速效也”。尽管如此，李详与汪本楹、尹炎武等安徽存古学堂学生有较深厚的师生情谊。尤其汪本楹，颇得李详器重，民元后两人“时通书问”，“议论”也相合，李详将其储在“心胸间，不能忘去”。

三、结语

概而言之，安徽存古学堂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办学大方向，与当时多数存古学堂并无不同，但其办学思路和具体运作在“不失其故”方面，明显走得更远。在清季盛行的“中体西用”言说中，“新教育”的建制和教学管理方式普遍被归入“西用”范畴，如果说张之洞倡言以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是在以“西学之用”较根本地改变“中学之体”的保存、研习和传承方式；则安徽存古学堂坚持以中国传统的“教法”和文教理念为根基，大体可说是“在传统中变”的办学履迹。前文所述无论是“古观风试”的招考办法、“附课生”与“校外生”的设置，还是“毕业不奏请奖励”的规定，皆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皖省官绅对于接续和传承中国传统学问的独特思考和选择。

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而言，汉学与宋学由对立到息争的演进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一大脉络。作为道咸以降“新学”的重要趋向之一，“调和汉宋”对晚清安徽学风的影响相当值得注意。光绪十三年吴汝纶（挚甫）曾训谕弟子姚永概：“为学宜撤藩篱汉、宋之篱撤而义理与考证兼收矣；文章、道学之篱撤而义理与词章兼收矣”。所谓“撤汉宋之篱”，正有“调和”二者之意。沈寂教授已注意到吴氏此言对姚永概的重要影响。前文所述清季姚永概与程朝仪、朱孔彰等人的交游和共同的办学努力，原本精研小学的程朝仪中年后笃志理学的治学道

路，胡元吉与诸多“博学能文之士”交友后的治学变化，皆提示着“汉、宋之篱”在清季安徽即便不是全无踪影，也相当式微。

“撤汉宋之篱”大体可说是摒除门户之见的另一种表述，却并不意味着放弃或改变本学派的核心学术理念和文化观。姚永概、马其昶等人对理学和“桐城文法”的坚守，程朝仪对“家法”的倾重，朱孔彰对家学的传承，揭示出清季安徽的“调和汉宋”趋向，基本以“撤汉宋之篱”或者说摒除门户之见的方式展开，与不通“家法”的“汉宋调和”论者异趣。不仅如此，清季皖中学风的一个显著特点正是学人对各自“家法”的护持，适与“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的流弊形成鲜明对照。

进而言之，“撤汉宋之篱”固然能体现清季安徽学风开放而少门户之见的重要面相，但却并非全部。本文所述李详与桐城派精英“和而不同”的学术交游、安徽存古学堂打破省域界限的招生运作和多元的教学氛围，便基本无涉“汉宋”，同样是当时皖学风尚的写照。尤其非皖籍学者李详对“桐城文法”颇不以为然，且曾公开批评桐城末流之弊，仍被礼聘为安徽存古学堂史学兼《文选》学教员，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清季安徽学界超越地域区隔、包容歧见的气度和胸次。

就学术因应时变的层面言，近代中国因中西“学战”的惨败而出现日益严重的文化危机。在此语境中，清季朝野皆有超越既存学术派别从而整合中国传统学术的努力。但中学内部并未由此而完全息争，在一些地方，“内斗”不仅在继续，其激烈程度甚至不逊于中西“学战”。崇尚理学的清流名臣赵启霖宣统元年出任四川提学使伊始，即以“讲经学离奇怪诞”为由，将深研今文经学的蜀中名儒廖平从高等学堂及优级师范学堂经学教员任上辞退，引发川中学绅“群起反对”。赵氏借学部之力才压制住川省学界的反对声浪，随即立“宋四先生祠”，并于祠内设存古学堂，意图以理学“转移”蜀中学风。

而安徽的特点则是沈曾植、冯煦等官方大员从学术倾向到办学理念，乃至办学背后的关怀与寄托，皆与皖省学绅有相当的共识。说其是一幅官绅在区域文化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上深度契合、在文教事业上通力合作的历史图景，似不为过。姚永概等桐城精英“撤中外之藩”以兼收并蓄的文化观，沈曾植办安徽存古学堂时沟通中西的“世界眼光”，皆提示着清季安徽学风的开放而多元不仅仅体现在中学各流别发展的内在理路上，还有颇具前瞻性地开放对待西学、积极因应时变的一面。

如果以“长时段”的眼光概而观之，在近代中国“经典淡出”的局面形成以前，注重师承“家法”而又不失开放包容，正是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清季安徽“在传统中变”的“存古”履迹和学术风尚部分留存了这一学术传统，说其是传统中国的“国性”(national identity)在近代特定时空中带有鲜明时代风貌的承续，似乎也不为过。

安徽存古学堂开办一学期后，辛亥革命爆发，民初教育部通令废止存古学堂。由于历时较

短，安徽存古学堂似乎没有多少令人瞩目的成效。但相关员绅的“存古”关怀却并未因该校停办而终止，类似的办学理念和取向似乎也在辛亥鼎革后延续。严复 1912 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力主将中西学“分二炉而各冶之”，故拟合并经、文两科大学，作为“完全讲治旧学之区”，“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这样的办学理念及其背后隐伏的“中西学各有体用”的文化观，与安徽存古学堂有明显的共性。实际上，严氏为践行其办学方针而为北大聘请的“教务提调”，正是姚永概。以“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眼光，将相关精英士人的文化观念和Activity回置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或许可以让我们 的历史记忆摆脱此前可能存在的“妖魔化”倾向，而更贴近于历史实况，进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 认知清季民初的时代特性以及“中国文明的传统特征”。